

全球通史

11

吉林文史出版社

全球通史

HISTORY OF THE WORLD

11

吉林文史出版社

时代生活出版公司

欧洲部编辑：埃伦·菲利普
策划部主任：埃德·斯凯纳尔
编辑资料部主任：萨曼塔·希尔
副主编：伊尔斯·格雷
策划部主任助理：玛丽·斯塔普尔斯

时代生活人类文明史图鉴

丛书编辑：查尔斯·勃伊勒

《城市的进程》编务：

编辑：法古斯·弗莱明
策划：拉塞尔·吉布森
研究人员：卡罗琳·卢卡斯（主要），
希拉·科尔
审稿：弗兰西斯·维拉德
露丝·科林斯
迪姆·库克
策划助理：桑德拉·亚克尔
编辑助理：摩里·苏珊兰德

图片部：

图片管理：阿曼达·辛德利
图片统筹：茹埃·斯宾塞

编辑制作：

制作助理：艾玛·维斯
编辑部：塞莱莎·约翰
德布拉·赖利奥
朱利特·罗伊德-普雷斯

本卷顾问

概论：

彼得·克拉克，经济和社会史教授，莱切斯特大学城市史研究中心主任。

古代城市部分：

特伦斯·C·米切尔，伦敦大英博物馆西亚古代文物保管员。

古典城市部分：

安德鲁·沃拉斯-海德里尔，雷丁大学古典学教授。

亚洲城市部分：

K.N.乔德胡里，伦敦大学亚洲经济史教授，辽东和非洲研究学院；休·肯尼迪，圣安德鲁大学中世纪史高级讲师。

中世纪及前工业城市部分：

彼得·克拉克，莱切斯特大学经济和社会史教授，城市史研究中心主任。

工业及现代城市部分：

马丁·道恩顿，伦敦大学现代史教授。

特约撰稿人：

奈尔·法尔巴恩，罗伯特·埃尔文，
迈克尔·克里根，马丁·雷顿，
阿兰·罗西安，约翰·曼（文献）

联系人：

伊丽莎白·克雷默-辛（波恩），克里斯蒂娜·莱伯曼（纽约），玛丽-温森莎·阿洛西（巴黎），安·耐顿森（罗马）

下列人员也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巴利·安托尼，詹尼法·伊克尔（亚历山大，弗吉尼亚），韦伯·范·德·林达（阿姆斯特丹），迈尔卡·甘迪卡斯（雅典），布里吉德·格劳曼（布鲁塞尔），玛莎·德·拉卡尔（里斯本），伊丽莎白·布朗（纽约），约瑟芬·杜·布鲁索尔（巴黎），安·怀斯（罗马），迪克·贝利（东京），安格拉·卢克尔，特劳多·莱兴（维也纳）

中文译者：

王 媛 李艳玲 张 昊 姜立杰 贺朝霞

《家庭的进化》编务:

编辑: 查理·博伊尔

策划: 里恩·布朗

助理策划: 拉塞尔·吉布森

研究人员: 卡洛森·鲁卡斯(主要),

希拉·科尔,

路易斯·塔可

审稿: 鲁希·科林斯

蒂姆·库克

助理编辑: 摩里·苏姗兰德

图片部:

图片管理: 阿曼达·辛德利

图片统筹: 伊丽莎白·特纳

编辑制作:

制作助理: 埃玛·维伊斯

编辑部: 特里萨·约翰

朱丽叶·劳埃德-普赖斯

本卷顾问

N.J.G. 庞兹, 印地安那大学历史和地理退休教授, 伦敦皇家考古所所长。

特约撰稿人:

埃伦·加尔福特, 迈克尔·克里根(文献); 卡罗林·阿尔科克, 莱斯·科尔曼(研究)。

联系人:

伊丽莎白·克雷默-辛格辛(波恩), 玛丽-温森莎·阿洛西(巴黎), 安·耐顿森(罗马)。

下列人员也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路易斯·福斯泰尔(弗吉尼亚, 亚力山大里亚), 约瑟夫·德·布鲁塞尔(巴黎), 迈克尔·多纳斯(布拉格), 伊丽莎白·布朗(纽约), 玛丽·约翰逊(斯德哥尔摩)

中文译者:

董小川

责任编辑:

袁一鸣

/ 目录 /

城市的进程

1	城市开拓者	9
2	古典城市的辉煌	33
	短论：阴影中的生活	63
3	繁华的东方之都	71
4	西方城市的复兴	91
	短论：想象的城市	114
5	气象万千的设计	123
	短论：城市公园	147
6	大都会时代	153

家庭的进化

	短论：躲避自然力	186
7	家庭生活的出现	195
8	中古家庭	231
	短论：婚姻的链条	269
9	家庭的领地	279
	短论：餐桌上的享受	313
10	避难的城堡	321
	大事年表	354

全球通史 | 城市的进程 |



城市开拓者

1

泥浆，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冲积平原上无处不有的泥浆，正是世界最早文明建于其上的物质材料。泥浆，制成统一规格的长方形泥块后，可以用来建筑房屋、庙宇和城墙。泥浆，压成平板之时，人们在上面记录商务活动、法律条文和宗教仪式。泥浆，定型锻烧之后，成了烹调和储存工具。泥浆，可用来塑造人物及动物像，代表了早期雕塑家对人类及动物世界的认识。但比上述作用更重要的是泥浆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层，它滋养了农作物，农作物滋养了城市。

如果小麦和大麦的长势不好，城市也很难发展，不仅是因为缺少食物。农作物不仅仅意味着维持生存：剩余农产品把农民从田地里解放出来，使他们成为工匠与商贩；组织必要的灌溉工程形成了统治者与管理者的阶层结构；粮食出口成为支付进口奢侈品的手段；随之增多的财富吸引了周围村庄的移民和商人。工作、政府、要买的东西、要见的人——任何现代城市的标志——所有这一切，最终，归结于泥浆。

大约公元前3500年，在生命之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畔，中东苏美尔文明就先发育于美索不达米亚的泥浆之中。苏美尔人的城市并不是世界上最早的城市：早至公元前8000年，就有大约3000人生活在杰里科城的围墙之内，杰里科是一座位于约旦河谷低段一汪清泉之侧的城市。但苏美尔人的成就是把许多这样孤立的定居地聚拢为一体，受同一统治者、法律、神灵和文化的约束。作为文明的先驱，苏美尔人在一段时期内独步天下，但其他文明很快赶了上来。埃及的泥浆、中国的及印度的泥浆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泥浆一样富饶多产。沿着世界上最壮观的一些河流——尼罗河、黄河、印度河——小小的河边定居地独立地成长为羽翼丰满的文明之邦。

导火索一旦点燃，就不可能熄灭。在全球人口中，城市人口比例稳步增长。有时城市人口只是聚集在文明成就最辉煌的地方：罗马，在公元前1世纪，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达百万的城市；长安，中华帝国之都，仅在几百年后人口也达到了这个数字。这些城市是它们那个时代的奇迹，但它们及类似它们的城市只不过是更大奇迹的先兆。随着工业化时代的来临，人们走向城市的断断续续的步伐变成了

浮雕上是公元前7世纪多产枣树与鱼的马达克图城（在今伊朗）。在这幅农业社会的和平景象下，城市人口的住宅都拥挤在防御性城墙之内。面对来自人类及动物的威胁，坚固的防御性城墙是城市生活的首要条件，它在城里的文明与外面的危险之间画了一道界线。但是马达克图人的安全感是不现实的：这座浮雕就是由他们好战的邻居亚述人在攻克该城之后雕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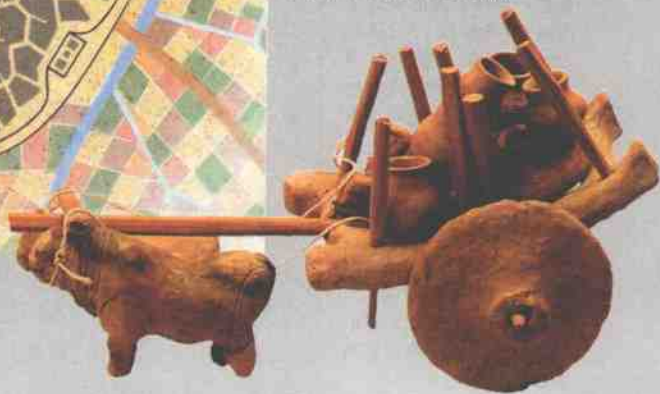
乌尔：城市布局图



乌尔是美索不达米亚最富庶的贸易中心之一。在约公元前2000年，它是兴旺的苏美尔文明的中心。它为早期城市生活树立了一个模式。在城里，拥挤的房屋和奇特整洁的街道都围绕着庞大的神庙建筑复合体，其中有拾级而上的庙塔，是献给月亮神南娜的。因为城市建筑不断地以倒塌的泥、砖建筑物的废墟为地基，因此整个城市高于周围洪泛区平原。城市由长达2公里的城墙围护。两条运河把乌尔与附近的幼发拉底河连接起来。运河不仅给城市的两个港口带来了海上贸易，而且为周围平原上纵横交错的灌溉系统提供了水源。

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城市一样，乌尔的生存取决于它的农民的努力。富饶的土地提供了充足的麦类农产品、蔬菜和豆类，也为成群的绵羊提供了牧场，而羊毛保证了乌尔兴旺的纺织品贸易。同时，农业上的丰足多产使相当一部分人口可以从事其他专门行业。编织、金属加工、石头雕刻只是当时乌尔的3万居民可以从事的专门行业中的几种。

赤陶牛车模型。在当时印度的中心城市摩亨佐·达罗，这种车运来粮食，维持早期城市的生活。



爆炸式的城市化进程。铺下沥青，拆掉围墙，城市不断以砖、机动车和水泥吞并着周围的村庄。到1990年，在居民达到2000万的大都市区——在那里，人们仍能发现被包围在巨大城市里的那些个别的区域中心——人们不再需要去找城市，城市来到人们身边。

但是，与城市的规模相比，更有意义的是城市给它的居民的生活所带来的变化。城市的种种约束焕发了社会变革的力量，密集空间内的共存要求新的行为准则。举例来说，正是法律观念把早期城市居民与他们的农村亲友区别开来；古代雅典人的抗议者即普通民众的要求产生了民主；19世纪工业城市的经历促使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写下了《共产党宣言》。变化不仅限于政治。在艺术和建筑领域，在教育和娱乐领域，在犯罪和商业领域，事实上几乎在一切领域，在人类的摩擦碰撞中闪烁着创新的火花。

从泥浆到大都市，城市的崛起是人类历史上——也是我们这个星球历史上——最壮观的景象之一。大约45亿年以来，地球上的生命按照自然选择的法则进化着。每种植物和动物都在自己的生态小环境里生存，在相互依赖的生存链条上，按照固有的传统完成其天赋的使命。人类同其他生命形式一样，受困于这种模式，他们也许比其他生物更有智慧，但他们的角色也曾仅限于为寻找食物而在大陆的可居之地漫游，从事狩猎和采集。

随着城市的来临，这种模式被永远改变了。人类改造了自己的定居地，找到了一个新的生存空间——事实上不只是一个，而是多得任你想象。因为城市生活的钥匙就是机会。一旦摆脱了勉强糊口的状况，城里人可以从事各种各样的专门行业——编筐、制陶、纺布、织布、皮革制作、木匠和石匠——市场需要什么就干什么。当市场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多样化时，机会也就变得多种多样。这看似简单的变化却影响深远。人们再也不用仅仅作为狩猎者及食物采集者为生存而挣扎。几个世纪的流逝使人们更加适应新的行业，现在向人们开放的行业不可胜数。可以说，人类已超越自然界原有的进化之链环。

这超越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由几千年中许许多多极微小的事件累积而成。几乎可以说正是自然本身赋予了人类超越自然的原动力。在公元前10000年左右，最后的冰川时代走向终结之时，地球上开始有了生命。冰川融化了，往昔被冰层覆盖的大陆裸露了出来，昔日凝固静止的水进入了大气循环之中，海平面升起，风含着雨，行迹遍于全球，把富饶带给了从前的不毛之地。在这个富饶的新世界，人类越来越不必要为找寻食物而四处漫游了。在一些地方，就有可能

建起全年运转的定居地，它的生活需要可以完全依赖周围的土地来供应。从定居到耕耘土地只是一小步。到公元前7000年，这些早期村民已经掌握了栽培农作物及驯养动物的技术，完成了从定居游牧者向技术熟练的农夫的转变。

新的生活方式蕴涵着惊人的生产力——同样的一块土地，曾几何时，只能供养一位狩猎者或食物采集者，现在可以供养200个农夫——而且生产力也因此而增长。那些农村不需要的多余劳动力可以自由从事各种专门行业。围墙拔地而起，围护着这些农业定居地，保护着它的居民和他们精心储存起来的粮食，以避免被专事掠夺的游牧者抢走。安全的诱惑，食物的充足及基本制成品的现货供应，像磁石一样吸引着附近的农民，村庄人口飞速地增长。

来到城市的人，不一定是定居者，许多来访者是行商身份。农民们一开始储存剩余粮食，就意识到粮食不仅能果腹，还可以用来交换生活必需品，甚至是只有其他地区才有的奢侈品。商人们的足迹渐行渐远，向外地传送了新的技术，如冶铁及玻璃制作技术，带回家的不只是新货物，也有新思想。

商业活动的必备条件之一就是记录货物的品质及数量的能力。从公元前4000年起，中东的商人就用黏土块印上象征性图案来记录商业往来情况，这些图案是可以望图知义的。例如，水平的月牙形可能代表带犄角的牛。这些象征性图案慢慢发展成了象形文字，不仅可以记录物件，还可以表示动作。例如，表示“吃”的文字就是一个头的形象与一个食物状的图形并列。

这些发展对农耕社会的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人们为了进行如灌溉类的公共福利工程或为了保卫土地而紧密联系到一起时，那种旧的、简单的对家庭或氏族的忠诚感扩大了。当手工艺匠们聚集到一个村庄谋生时，这个农业村庄就成了小市镇，农民可以用他的剩余粮食或牲畜换来一副铜犁、一个陶罐或一张木床。成功的农民可以从其他时运不济的农民手里买下土地，后者只能靠出卖劳力来生活，这样，社会阶层的分化开始出现。商人阶层要求有法可依——法律由新出现的文化人付诸文字——许多事务需要法律依据：商业交往、船运费、公平的工资、价格管理及贵重金属如金、银的兑换比率。越来越多的规则出现之后，中枢政府和市政服务部门随之出现，来管理城镇五花八门的活动。

当这些因素集中于一个社会实体的时候，城市就诞生了。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定居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的苏美尔人引导世界进入了文明时代。

冰川大融化的一个主要受益者就是“新月沃地”，一块绿叶青葱的弧形地域，起于波斯湾，沿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向安纳托利亚山延伸，然后折转靠向地中海的东部海岸线。这里土地肥沃，平原上小麦、大麦一望无际，山丘之上，树木并不很茂密，但野生动物却很多。大自然的恩赐如此慷慨，令这里的狩猎者及食物采集者无法视而不见。他们逐渐放弃了游牧生活，定居下来形成了农业社会。

苏美尔人就在这些人之中。苏美尔人可能起源于“新月沃地”的东北部，到公元前4000纪，移居到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低部草木繁盛的地方，两条河流在此汇合，向南流入波斯湾。

这里却不像是文明可以诞生的地方。没有石头也没有木材来筑造房屋，没有宝石或者贵重金属可以输出——事实上，除了大片大片的泥浆之外，没有别的。但那已经足够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几百年的冲刷在这里的广袤平原上沉积了肥沃的土壤层，把河水引入灌溉渠并不费事，干旱之地终成良田。似乎有着无限的生产力的土地，因苏美尔人使用的结实的铜口犁和他们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发明的轮式农具，而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滋润土地的水提供了方便的贸易通道，多余的粮食可以沿着这条通道运出去，换来本地缺少的商品。

这是公元前3000纪来往于美索不达米亚水道上的船只的银质模型，突出表现了船的流畅线条。当时这种船是由成捆的芦苇捆捆扎在一起，外面刷上防水的沥青制成的。这种平底船特别适合于这个地区很浅的湖水与沼泽。在陆地交通线路广泛使用之前，水上交通是古代世界城市贸易中心之间的主要通道。

收获季节来了又去，粮食储存增加了，农业人口也增多了，村庄成了城镇，城镇又发展成为城市。公元前3000纪的中期，苏美尔人已经在美索不达米亚大部分地区确立了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霸权。生活在十几个城市里的苏美尔人在改良灌溉、发展贸易、形成法律条文、确立中枢政府方面走在了前列。从这些城市里，形成了城邦国家——乌尔、埃利都·乌鲁克、尼普尔和拉尔萨，是最早的一批——它们的权限涵盖城市及其周围的土地。

在连接这些城邦国家的文化行为中，宗教有着最深



刻的印记。每个城市都供奉着一位神，或者按照苏美尔人的神话，是神选择了城市作为他的凡间居所，城市被认为是某一位神及其家人的私有财产。理所当然地，建在平坦泥浆地上的神庙就成了城市生活的中心。一座庙宇倒塌了，一座新的庙宇一定会建在那神圣的遗址之上。渐渐地，后来的神庙建在了越来越高的废墟遗址上。庙宇的建筑风格也呈现阶梯形——即人所周知的庙塔——高耸于周



一条底比斯人的饰带，装饰着玛瑙贝，由安纳托利亚出产的银制成。



出自尼姆鲁德的版画，上有一位身着埃及服饰的青年，此画综合了非洲的象牙雕与利凡特的技艺。



围建筑物之上。

城市之神通过他的人文代表他被称为恩(en)，与市民取得联系。至少在城市早期，世俗事务要由一个两院制机构的民主程序做出决定，两院包括由全体自由民组成的下院和一个由“长者”组成的上院。在紧急情况发生时，市民会任命一位卢伽尔或国王。有时，卢伽尔与恩合二为一，使国王成为神在人间的代表。随着时间的流



阿富汗的天青石装饰了一件为一位乌尔市民而做的头饰。

贸易是世界上城市出现的标志。周围乡村生产的剩余农产品不仅解放了农民，使他们可以成为各种手工艺工匠，而且，提供了一种商品，可以用来交换如建筑材料之类的生活必需品，或者当人们生活更富裕时，用来交换奢侈品——金、银、象牙和比较珍贵的石头。商品贸易不仅限于原材料，一些城市成为兴旺的加工中心，利用他们新的掌握了技能的劳动力资源，把进口的原材料加工成精致的出口商品。

当商人行程更远时，商业联系把最早的城市联结起来，最后，把文明联结起来。例如，埃及的金子、黎巴嫩的木材、安纳托利亚的黑曜岩、印度的光玉髓和来自阿富汗山区的天青石都流入了美索不达米亚。通过船只、驴车、骆驼队和牛车，世界上的资源物产都被调动起来服务于文明的鉴赏力。

商业联系

逝，卢伽尔的职位成为终身的，最后成为世袭的，这样就出现了王朝。同时，富人大量购置土地，雇无地农民来耕作，这些富人成为贵族阶层的核心。

对在这一地区城市间旅行的苏美尔人来说，庙塔的独特轮廓是一个熟悉的景象。同样的——也是令人沮丧的——城墙也是一个熟悉的景象。尽管有很近的文化亲缘关系，苏美尔的城邦国家之间各自为政、极其独立。它们彼此距离不远，常常就在对方视野之内。当它们统治下的土地延伸之时，它们就会不断地卷入关于灌溉权和边界的争执，这种争执对立常引发军事冲突。当它们彼此休战时，它们还得提防从事劫掠的部族人，后者有规律地从西边沙漠或东部山区席卷而来。直到公元前2334年，第一批城市出现后的1000年，一位叫萨尔贡的国王首先控制了苏美尔，然后控制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他实行了一套中央集权制，在一座城市里发号施令，统治整个国家。

萨尔贡统一大业的继承人是乌尔城的国王们。乌尔城在公元前2112年达到了兴盛的顶峰，统治了从安纳托利亚山到波斯湾的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在接下来的100年里，这个帝国的统治者开始了一项生机勃勃的公共建筑工程，由专业建筑师指导。乌尔的庙塔重建成一个比例优美匀称的三层建筑。每层楼台都铺着砖面、饰有扶壁和镶嵌图案，可能还种上了树。塔高20米，顶端是献给乌尔之神月亮神南娜的宝座，循阶梯而上就可以到达这个宝座。神庙周围是围墙及一些宗教性建筑物如露天礼拜场地和礼拜堂。神庙之外是一座王宫、神庙的仓库及高级神职人员的住宅。这种建筑观念在以后的1500年里被整个美索不达米亚的各个城市竞相模仿。

围绕着神庙与王宫的是城市主体——在60公顷的区域内，沿着曲折的街巷，是一幢幢两层的土砖房屋。房屋的修建没有什么统一规划，完全由土地所有者自己决定。街道没有铺砌，下大雨时，变得极其泥泞。街道的宽度不足以通车，车子很



古代官员柱像。一位埃及宰相（对页）和一位美索不达米亚卢伽尔（左图），即使是模拟像也保持着他们的权威。在城市的各级政府部门中，宗教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作为高度组织化的官僚体系中的一位高级官员，埃及的宰相是由法老任命的，法老自己被认为是神。同样，卢伽尔被认为是其所在城市的神的人间代表。但是，虽然理论上他拥有绝对的权力，但他的权力只有在与神职人员紧密磋商之后才可以行使。